

19世纪中国公共卫生起步一瞥

方益昉

每当公共健康危机爆发时,有识之士总有变通的方法,整合民间力量,运用市场调控,找到临时性方案,达到健康保障与疾病预防之目的。

中国历史上,很长时期内并无所谓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皇家太医及其相关机构的设置,主要是为皇室服务,与国民百姓的健康维护关系不大。1840年之后,清朝海关被全权委托给外国人管理,海关开始逐步建立卫生管理系统,但主要目的是对与自身有关的进出口业务进行监督。所以,海关卫生机构既不是管理公共卫生的部门,也不负责我国国民健康。

但是,每当公共健康危机爆发时,有识之士总有变通的方法,整合民间力量,运用市场调控,找到临时性方案,达到健康保障与疾病预防之目的。比如19世纪初,牛痘接种免疫技术对预防天花积极有效,这项

方案就是民间机构自发启动,然后在全国各地推广运作的成功样本,个中建设性意义,作者已予以医学史和社会学层面的探讨(拙作《晚清痘师局:商业路径与职业操守》,载《知识分子》2016年6月27日)。

具体而言,1805年,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利用公行的统一善机制,以商代医,反哺社会,探索民间公共卫生预防体系。至少,他们引进牛痘疫苗,免疫接种预防天花,就是功德无量的民间公共卫生事业,同时探索的疫苗扩种技术,某种程度上也接近现代微生物技术研发。

1802年开始,东印度公司驻澳门的资深外科医生皮尔森,已经凭一己之力,在澳门坚

持三年,接种牛痘,散发种痘广告和技术简介。三年后,一批嗅觉灵敏的粤商,开始接洽皮尔逊大夫。他们虽然不是专业医学人士,但出于对海外新技术、新事物的关注,试图发掘接种牛痘、预防天花这个新事物上潜在的创新机遇。

广州十三行行商们判断,抗击烈性天花的技术产品和接种服务,一旦全面铺开,不仅带来巨额商业利润,还可以积德行善。所以,预防天花这项意义重大的战役,并不是由政府引导开启的,也不是由医学界最初主导的,成为先行者的是当时的广州商人。十三行集资创立了牛痘接种善局,由代表行商协会的公行出面,负责投资运营,比耶鲁大学伯驾医学博

士首次引进现代医学、设立规模宏大的博济医局,提早了30多年。

1817年,经皮尔森一期培训,编撰《引痘略》的痘师邱燿(浩川,即西方人笔下的A. Hequa或Dr.Longhead),归纳疫苗接种内容,提出天花预防的本土服务模式,重点改良疫苗的留种、扩增与保存,在牛痘接种上自成一派。

其实,在推进牛痘接种的市场份额和争取社会效应的过程中,邱燿面临的政商干扰、技术困境、疗效质疑并不少,他的处境不比目前临床新技术应用的医学人士的环境宽松。他统筹打点种痘之外的心思,一样十分复杂、焦虑。尽管起步阶段如此不易,未来一个世纪里,牛

痘接种居然还是在没有政府调控,没有公共卫生部门监管,不依托传统中医的局面下,逐渐营造起来了。以今日眼光看,史上冠以“邱氏世业”盛名的牛痘种植,本质上是转化西方新颖技术,这个案例也可视为近代社会共建防病机制的成功案例之一。

广州十三行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经济地位和历史作用,梁家彬先生1937年所著《广东十三行考》已经基本确立框架。值得补充的是,当时这个对外开放窗口在促进西医东渐和西医人才培养方面的萌芽迹象。比如,1841年9月,已

(下转10版) →

← (上接8版)

论,有明于元代士大夫之画高出唐宋,而以明季隐逸簪纓之画不减元人,务从笔法推寻,而不徒斤斤于皮相。(参看黄宾虹:《黄宾虹文集·书信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杨联陞1956年6月27日致蒋彝的信中说:

Bollingen信,这次在我也出于意外。因为就情理推断,可能已很大了。不过此项计划,我最初就觉得可疑,因为今日美国之美术博物馆与弄中国画的人,情形与喜龙仁当年调查时已大不同。您所谓情形复杂者是也。真正作起来,怕也要得罪人。因为大家眼光可以不同,而中国画之真伪又实在难辨,所以不作也好。(参看杨联陞:《莲生书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7-48页。)

网上有张大千给喜龙仁写的书法作品,释文如下:

喜龙仁博士致力吾华绘画垂五十年,著作等身,举世奉为矩矱。十年前,予自天竺还居香港,先生亦游于是,访予寓斋,因尽出敝藏相与纵观上下古今。所论莫不相合。恨相见晚也。此十年来,予南北东西,未有定止。先生好游,时时握手东京,京都间,顷者予来游上都,适逢先生八十大寿,夔铻尤胜

十年以前。他日必更有鸿篇巨着以饷世人。敢先生饷世人者,以先生为不朽。

近代来华外国人的汉名

近代来华居住时间较长的欧美人大多会学习汉语,并且会起个汉化的姓名。汉名就是汉化的姓名,跟欧美人姓名的音译很不同。比如费正清是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的汉名,此名为梁思成所起,但是得到他本人认可,并且在华期间长期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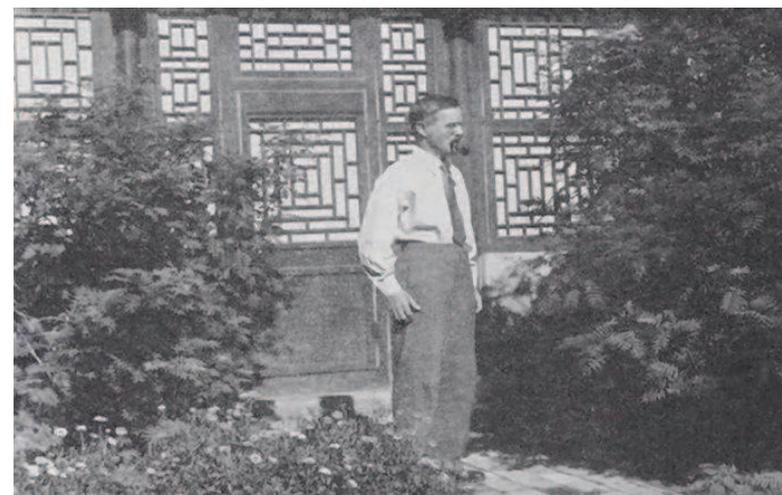
伯希和(Paul Pelliot)和喜龙仁(Osvald Sirén)也正是这样的汉化的姓名。什么叫汉化的姓名?汉化的姓名就是完全模仿中国汉族人的姓名习惯的姓名。常见有人自作聪明的将Paul Pelliot译为保罗·伯希和,将Osvald Sirén译为奥斯瓦尔德·喜龙仁。这就像将John King Fairbank译为约翰·金·费正清或者约翰·费正清一样,是不伦不类的。同理,James Cahill只能译为高居翰,不能译为詹姆斯·高居翰。

有些近代来华欧美人甚至有字号之类的别名。伯希

喜龙仁
在日本看中国古画



喜龙仁
立于中国园林中



和,字履中(参看《恽毓鼎澄斋日记》,页453);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字茂生(A Perpetual Fire,pp59-61);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字协和

(王世襄:《锦灰不成堆》,页90、92、95、99,李经国编《奇人王世襄》,页71)。

(作者为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本文为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来华艺术史学者研究[15YJC760117]”的阶段性成果)